

# 中晚唐循吏观念的复兴与书写

吕家慧

(香港城市大学 中文及历史学系,香港)

**摘要:**中晚唐政治文化中出现汉代“循吏”观念的复兴,表现在文学领域便是“循吏”书写。初盛时代,政治文化中重文儒之礼乐化成,轻视实务,排斥案牍,文人儒者多不愿任州县官。安史乱后,重建政治秩序为首要,文儒的理想失去现实基础;州县凋敝,亟待复兴,遂带来制度到观念之极大变化。政能受到重视,地方官的作用得以突出。大批文人儒者出任地方官守,乃以古“循吏”或“良吏”建立自己的身份及价值认同,由此带来了中晚唐“循吏”观念的复兴。这批地方官以“循吏”观念与视野书写,形成了中晚唐文学的“循吏”书写现象与书写模式。

**关键词:**循吏;中晚唐;书写模式;地方官

**中图分类号:**I 20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18)05-0106-09

## 一、从政吏到循吏： 盛中唐的观念转变

中晚唐政治文化中有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就是汉代“循吏”观念的复兴,与之相关,在文学方面也出现了新的现象,即是有关唐代“循吏”的书写。

唐前期的政治文化中存在所谓“吏治与文学之争”,或者说“文儒”与“吏能”之间的紧张。<sup>①</sup>这种紧张源自儒家政治文化观念结构中两个层次之间的关系。按照孔子的说法,“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道德文化秩序的建立高于政治法律秩序。<sup>②</sup>在唐代,所谓文儒代表的是道德文化秩序,而吏治代表的是政治法律秩序。前者的源头是儒家的一套核心价值,即道;后者的权源是最高统治者皇帝。两者各自为唐代政治权力结构的一个部分,共同为

皇权服务,但是两者之间要保持一种恰当的平衡关系却并非易事。下面一段记述反映出当时两者之间关系的实态:

张燕公(引者按:张说)尝谓人曰:“学士者,文儒之美称,皆须诏勅特授,岂合因循自名?”时贺知章从太常少卿迁礼部侍郎,兼授学士。一日并谢论,谒宰臣。源侍中(引者按:源乾曜)曰:“贺公久著盛名,今日一时加二荣命,并为学士之光辉。虽然,学士与侍郎,二者孰为美?”燕公曰:“侍郎自皇朝已来为衣冠之华选,自非履歷清要,望实且美者,无以居之。虽然,终是具员之吏,又非往贤所慕。学士者,怀先王之道,为搢绅轨仪,蕴扬、班之词彩,兼游夏之文学,始可处之无愧。二美之中,此为愈也。”<sup>③</sup>

贺知章被授礼部侍郎,兼授集贤院学士。前者是政治权力系统中的一个重要职位,但其职能与意义只是政治性的,故“终是具员之吏”。集贤院学士则不同,“学士,文儒之美称”,有道,有文采、知识,为士大夫阶层的典范,代表的是儒家的道德文

**收稿日期:**2018-01-02

**作者简介:**吕家慧,女,台湾台中人,香港城市大学中文及历史学系助理教授。

① “‘文儒’作为一个合成词,其意为‘儒学博通及文词秀逸者’,借指盛唐活跃于政坛和文坛上的一批文词雅丽、通晓儒学的文人。”葛晓音:《盛唐“文儒”的形成和复古思潮的滥觞》,《诗国高潮与盛唐文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75页。

② 余英时:《汉代循吏与文化传播》,《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台北:联经出版社1987年版,第184页。

③ 明陈耀文纂,屠隆校:《天中记》,清刊本,卷三十,第45页a。此节“贺知章”以下内容又见于《大唐新语》,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卷十一,第165页。文字稍异,但关键部分相同。

化价值。在张说的心目中,“文儒”比“具员之吏”重要,表明道德文化价值高于政治法律。

张说的观念在当时以文儒自视的士人阶层中具有相当的普遍性。文儒鄙视长于“政能”而薄于“辞学”的政吏,而政吏则为“吏能”辩护<sup>①</sup>。安史乱后,政治秩序的重建最为迫切,政吏的重要性凸显。这种转变在科举及选举制度方面体现出来。选人标准由偏重文学才能到实际的治理能力。杨绾《条奏贡举疏》批评前代取士“不思实行”,要求科考策问“古今理体,及当时要务”<sup>②</sup>,陆贽《贞元改元大赦制》以“能言者不必适用,蕴用者或未能言”<sup>③</sup>,均强调政能。

初盛唐时期,文人儒者排斥职在刀笔案牍的州县官员,安史乱后,面对战后地方凋敝的现实,州县官的重要性日益突出。朝廷一再强调州县官员对于重建秩序的重要性。中唐以前,原有“不历州县不拟台省”的规定,但并没有真正落实,中唐以后,则逐步落实,这就使得文人儒者无论是否自愿,都必须仕在地方。<sup>④</sup>州县官的选拔也强调政能。德宗时诏举堪任刺史、县令者,宰相欲以文词校之,薛珏则云“求良吏不可责文学”<sup>⑤</sup>,这正与李林甫“但有材识,何必辞学”的观念一致。

文人儒士对于政吏的观念也发生了巨大转折。韩愈评樊宗师“习于吏职,识时知变,非如儒生文士止有偏长”<sup>⑥</sup>,把治理才能置于文学之上,贬抑儒生文士,与唐前期对于文儒的评价形成鲜

明对照。不仅如此,文人儒者对原本被轻视的地方官,观念上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他们把当代的州县官放到汉代的循吏传统中,重建关于州县官的价值地位及本人的价值认同。这带来中晚唐有关循吏观念的复兴。

汉代的循吏观念有一个变化过程。《史记》中“循吏”是“奉法循理之吏”<sup>⑦</sup>,代表汉代前期尚黄老思想下的观念;《汉书》中“循吏”则是儒家的观念,兼有“吏”与“师”两种身份,一方面担负着建立与维护地方政治法律秩序的责任,另一方面也承担着传播儒家大传统的文化使命。<sup>⑧</sup>初盛唐时期少有以“循吏”称誉地方官者。李邕《谢元宗书上考表》说“岂有循吏,得预词林”<sup>⑨</sup>,虽属自谦之词,但却反映出当时的观念,即循吏长在政能,所以不得预词林。即便偶有正面以循吏相称者,也往往肯定其有礼乐教化之另一面。李隆基称崔日知“妙旌循吏德”,然不忘言其“礼乐中朝贵”<sup>⑩</sup>;孙逖谓裴耀卿可传循吏,但要强调他“周旋礼乐”<sup>⑪</sup>。

安史乱后,大批的文人儒者出仕州县。在国难面前,这些人的强烈社会责任感被激发出来,他们不再消极负面地看待地方官,而是重其崇高使命与价值。观念变化促使这些文人儒士在汉代儒家循吏观中寻找价值认同。杜甫《同元使君舂陵行》称赞元结“当天子分忧之地,效汉官良吏之

① 开元23年,玄宗欲启用“有政能”的牛仙客为尚书,张九龄以其“目不识文字”而表示反对。张九龄的政敌李林甫则驳以“但有材识,何必辞学”,可见两者矛盾。见《旧唐书》卷106,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237页。

② 《全唐文》卷33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484页。

③ 《全唐文》,卷461,第2083页。

④ 葛晓音:《中晚唐的郡斋诗与沧州吏》,《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第93页。

⑤ 《新唐书》卷143,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689页。

⑥ 《与袁相公书》,马其昶校注、马茂元整理:《韩昌黎文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22页。

⑦ 《史记》卷130,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317页。

⑧ 余英时:《汉代循吏与文化传播》,《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第197、198页。

⑨ 《全唐文》卷261,第1172页。

⑩ 《赐崔日知往潞州》,《全唐诗》卷3,第36页。

⑪ 《唐齐州刺史裴公德政颂》,《全唐文》卷312,第1402页。

目”,正是如此。<sup>①</sup>循吏维护政治法律的功能受到了正面的肯定。常袞“使奉科条,变贪官之节,激循吏之行”<sup>②</sup>,欲以科条重整秩序;白居易指出当代法理不行,在于“官吏不循其法也”,自称“我为刀笔吏,小恶乃诛锄”。<sup>③</sup>这些有别于前代对于案牍之吏的鄙视,而正面肯定其职能。与此同时,文人儒者亦重视循吏的道德教化功能。贾至称“良化惠风,在于循吏”<sup>④</sup>,杨凭说“王者法天地之治,赞其化育者,其惟循吏乎”<sup>⑤</sup>,均凸显循吏在建立道德文化秩序方面的作用。

中唐以后,“循吏”的形象不仅已经正面化,而且地位崇高,以“循吏”正面誉人的例子大量出现。诸如“典司通邑,著循吏之名”<sup>⑥</sup>、“书于循吏,为后法程”<sup>⑦</sup>、“古之循吏,公之报政,皆是道也”<sup>⑧</sup>等等,皆以“循吏”高度评价政治人物。时人亦以进入正史“循吏传”嘉勉当代文人儒者。耿漳《送大谷高少府》“应知史笔思循吏”<sup>⑨</sup>,权德舆“足以列于文苑,附于循吏”,刘禹锡“文苑振金声,循良冠百城。不知今史氏,何处列君名”<sup>⑩</sup>,都以入循吏传勉励地方官员。吕温则以循吏自期,其《道州刺史厅后记》“予自幼时读古循吏传,慕其为人,以为士大夫立名于代,无以高此”<sup>⑪</sup>,以循吏为士大夫立名的最高标准,与张说文儒为“搢绅轨仪”的立场形成鲜明的对照。

## 二、循吏观念与循吏书写

由于中晚唐文人多具备地方行政经历,客观上使得地方官及其相关问题进入文人的视野;由于循吏观念的复兴,则地方官及其相关问题被置于循吏的传统中,从而与循吏传统建立了观念及价值上的关联。于是在中晚唐文学中出现了一个新的文学现象,即对于循吏的书写。

中晚唐文人儒者歌咏州县官员的作品大增,循吏的书写随之兴起,且形成了某种程度的书写模式。这种模式源于此一时期文人儒者对于循吏的价值认同,一方面是地方官自我认同为循吏,另一方面时人将地方官视作循吏。地方官会按照循吏的观念自我塑造,书写者会按照循吏的观念塑造州县官。杜甫《同元使君舂陵行并序》称赞元结“当天子分忧之地,效汉官良吏之目”,显然把道州刺史元结放到循吏的传统中视之。杜甫云:“今盗贼未息,知民疾苦,得结辈十数公,落落然参错天下为邦伯,万物吐气,天下小安,可待矣。”<sup>⑫</sup>在天下大乱背景下,他把元结这种古循吏式的地方官看作是安定天下的关键。白居易《秦中吟·立碑》以望江县令麴信陵为主角,盛赞其“抚惇嫜”的“仁政”<sup>⑬</sup>,此类主题罕见于唐前期;萧缜亦有《前望江麴令颂德》诗:“政绩虽殊道且同,无辞买石纪前功。谁论重德光青史,过里犹

① 仇兆鳌:《杜诗详注》,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691页。循吏有广狭二义,狭义原本指《史记》《汉书》循吏传中的人物,广义则不限于循吏传,泛指良吏。唐人多在广义上使用,循吏与良吏涵义大体相同。白居易《苏州刺史谢上表》“宜择循良之吏,委以抚绥”,即是如此。

② 《大历五年大赦天下制》,《全唐文》卷415,第1780页。

③ 《和微之诗二十三首:和除夜作》,谢思炜:《白居易诗集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744页。

④ 《诫示诸道制》,《全唐文》卷366,第1646页。

⑤ 《唐庐州刺史本州团练使罗珣德政碑》,《全唐文》卷478,第2163页。

⑥ 梁肃:《为人祭柳侍御史文》,《全唐文》卷522,第2351页。

⑦ 权德舆:《送循州贾使君赴任序》,《全唐文》卷490,第2218页。

⑧ 权德舆:《大唐湖南都团练观察处置等使朝散大夫检校左散骑常侍持节都督潭州诸军事兼潭州刺史御史中丞云骑尉赐紫金鱼袋李公遗爱碑铭并序》,《全唐文》卷496,第2238页。

⑨ 《全唐诗》,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版,卷269,第3001页。

⑩ 《吕八见寄郡内书怀因而戏和》,《全唐诗》卷364,第4104页。

⑪ 《全唐文》,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版,卷628,第2808页。

⑫ 《杜诗详注》,第1691页。

⑬ 《白居易诗集校注》,第171页。



歌卧辙风。”<sup>①</sup>望江县令的政绩当然不能与显官之经国伟业相比,但是,放到循吏的传统中看,正是这些“名不闻京师”的地方官在国家的治理中占有重要地位,其行“仁政”的道德价值一样崇高,可以光耀青史。值得注意的是,两首诗都写到了县令死后应百姓要求葬在当地的事实,两位作者都用了汉临淮太守侯霸被征、百姓攀辕卧辙不许去的故事,这样就把望江县令与汉代的循良吏传统联系起来。从书写方式看,“攀辕卧辙”也正是传统循吏书写的模式。元稹《阳城驿》、白居易《道州民》《和阳城驿》,都以阳城作为歌咏对象,刘禹锡《白太守行》咏白居易,欧阳詹《益昌行》咏利州牧陆长源,贯休《循吏曲上王使君》盛赞使君功绩,都是直接以地方官守作为书写的对象,并且放到循吏传统中而予以高度的赞扬。在中晚唐,循吏的书写也已引起时人的特别关注。权德舆为崔元翰和权若讷的文集作序,特别强调其“记循吏政事”“记时贤循吏”<sup>②</sup>的作品,一方面说明叙写循吏的文章在时人文集中占有一定的分量,另一方面也表明唐人对此类作品的重视。

儒家观念中的循吏包括“政”与“教”两方面功能,前者是其政治职责,后者乃是文化使命,这些恰恰构成唐代循吏书写的观念基础,也成为唐代循吏书写的基本模式。但在唐前期,文儒以教为己任,轻视政能,但安史乱后,政能受到了特别的肯定。这种观念变化也在循吏书写中体现出来。唐前期的循吏书写往往强调在地方施行礼乐教化,如张文琮出建州刺史,认为“礼典既阙,风俗何观”<sup>③</sup>,便以兴礼乐来移风易俗。但中晚唐的循吏书写中,对于具体行政事迹即所谓“善政”颇多正面的叙述。元稹的《茅舍》写洪州刺史韦丹

在当地推行陶瓦建筑事<sup>④</sup>,作者乃是将其放入到循吏传统中记述,这样推行陶瓦建筑之事在循吏观念的视野中获得了新的价值与意义。元氏《代杭人作使君一朝去》褒美白居易在杭州的治绩。白居易称“民非政不义,政非官不举”,强调政务的重要性;自己治州,具列“刺史要知者四条”,巨细弥遗地记录钱塘湖的地理特征,“湖之利害,尽究其由”,还涉及“稻粱之利”“生民之命”等,都是重政之一面。<sup>⑤</sup>

就教的一面说,唐代的循吏书写多涉地方官道德教化移风易俗事。元稹《阳城驿》颂美道州刺史阳城德行,感化邑人,“公亦不遗布,人自不盗牛。问公何能尔?忠信先自修”<sup>⑥</sup>,赞其为修德化俗的典范。与唐前期相比,中唐以后循吏教化成俗的书写多强调对于在地风土风俗的理解,以之作为化育百姓的前提。《后汉书·廉范传》赞扬廉范为太守能够“随俗化导,各得治宜”<sup>⑦</sup>,柳宗元明确肯定“因俗成化”是“二千石楷法”<sup>⑧</sup>,明显继承了汉代循良吏传统。韦处厚认为“设法施行,须顺风俗”<sup>⑨</sup>;韩愈谓柳宗元任柳州刺史时,“因其土俗,为设教禁,州人顺赖”<sup>⑩</sup>,这些观念都与循吏传统有关。正因为有“随俗化导”的观念,使得这批循吏式地方官留意地方风俗,并有相关的书写。如白居易《征秋税毕题郡南亭》《和三月三十日四十韵》,刘禹锡《阳山庙观赛神》《竞渡曲》《采菱行》《竹枝词》《连州腊日观莫徭猎西山》,柳宗元《柳州峒氓》《岭南郊行》《观放鱼歌》等,无不涉及地方风土风俗的叙写,其间亦体现出对于民生的关怀。对于这类作品,学术界多置于乐府诗的传统中视之,此固然不错,但是,儒家的

① 《全唐诗》卷563,第6537页。

② 《全唐文》卷489、493,第2214、2231页。

③ 《下建州教书》,《全唐文》卷162,第730页。

④ 周相录:《元稹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76、77页。

⑤ 《钱唐湖石记》,《白居易文集校注》,第1842—1844页。

⑥ 《元稹集校注》,第38页。

⑦ 《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卷31,第1103页。

⑧ 《永州韦使君新堂记》,《柳宗元集》,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733页。

⑨ 《驳张平叔巢盐法议》,《全唐文》卷715,第3255页。

⑩ 《柳子厚墓志铭》,《韩昌黎文集校注》,第512页。

循吏观念恐怕是这类书写的更重要的思想基础。

循吏之为政依据的是政令与法律,其施教则源于其坚守的道德文化价值。白居易论牧宰,“于人有父母之道焉,于吏有君臣之道焉”<sup>①</sup>,“君臣之道”代表的是权力关系,这种关系用之于行政权力系统(“于吏”);“父母之道”代表的是道德关系,这种关系用之于官民之间(“于人”)。官对于民自然有权力关系,但白居易强调的则是道德关系,突出为政背后的道德价值。基于儒者的价值认同,这批地方官在施政的过程中体现出强烈的儒家民本立场(父母之道)。“忧庶黎”正是这种立场的集中体现。这批文儒型地方官既是被书写者,其本身也是书写者。他们以循吏的观念与视角写下了大量有关庶民百姓生活及疾苦的作品。如韦应物《观田家》,钱起《观村人牧山田》,白居易《观刈麦》《观稼》等作品,主题相类,都是站在循吏的立场写农事,表达对于百姓生活勤苦的同情。一旦来自权力系统的政令与自己的价值立场发生矛盾,唐人笔下的地方官守,往往不惜对抗为权力结构中的“君臣之道”,而坚守待民的“父母之道”,而这又与汉代的循吏传统一致。元结《舂陵行》的创作背景是“道州旧四万余户,经贼已来,不满四千,大半不胜赋税,到官未五十日,承诸使征求符牒二百余封,皆曰:‘失其限者罪至贬削。’”是服从权力的“君臣之道”,还是坚守待民的“父母之道”,元结选择了后者,“逋缓违诏令,蒙责固其宜”,宁愿违背诏令,承认政治责任。<sup>②</sup>杜甫即高度肯定元结“忧庶黎”的精神,赞扬其“致君唐虞际”的情怀。韩愈强调张署为民上疏请命,要解除符州“折户租,岁征绵六千屯”<sup>③</sup>的不合理负担。阳城任道州刺史时,“赋税不时,观

察使数销责。州当上考功第,城自署曰:‘抚字心劳,追科政拙,考下下。’”<sup>④</sup>对比汉代循吏儿宽收税时“与民相假贷”,导致“以负租课殿,当免”<sup>⑤</sup>,实有精神上的一致性。

在传统的循良吏书写中,还有一种神异书写模式,即借神异之事来写循吏施政之效,“猛虎渡河”与“飞蝗出境”乃是其基本模式。<sup>⑥</sup>这种神异书写自有其观念的基础,即天人感应,善政可以感天。此一模式在唐代也有延续与发展。白居易《新乐府·捕蝗》“我闻古之良吏有善政,以政驱蝗蝗出境”<sup>⑦</sup>,“以政驱蝗”正是善政感天观念的表现,这表明白居易对此一传统的认知与认可。《祷仇王神文》记其任杭州刺史,当地有虎出没伤人,“居易与师儒猥居牧宰,惭无政化,不能使之渡江出境”<sup>⑧</sup>,于是以杭州刺史的身份祷神去虎,说明白氏自觉地将自身置于循吏的传统当中。韩愈长潮州,吏民苦鳄鱼之患,韩氏作《祭鳄鱼文》,同样基于德可以感天,驱除鳄鱼。韩愈《南海神庙碑》从孔戣祀龙神的神异事件入手,歌咏孔氏事神治人的功绩,《柳州罗池庙碑》写柳宗元死而为神以食其土,表达吏民对于柳氏的爱戴,亦是从神异的角度烘托其人治绩。柳宗元《说》虽然反对致雨反风,蝗不为灾,虎负子而趋等神异之事的产生与人力有关,但《零陵郡复乳穴记》以连州百姓歌颂崔君敏政化土石,使石钟乳复出,《永州崔中丞万石亭记》又叙永州百姓观万石亭景,以为“天坠地出,设兹神物,以彰我公之德”<sup>⑨</sup>,均以地方“祥瑞”为官守德政的表征,只是柳宗元进一步以人事解释此类“神异”,符合他反对天人感应的基本立场。

在唐代的循吏书写中,还出现了一个新的趋

① 《策林·牧宰考课》,谢思炜:《白居易文集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475页。

② 《全唐诗》卷241,第2704页。

③ 韩愈:《唐故河南令张君墓志铭》,《韩昌黎文集校注》,第461页。

④ 韩愈:《顺宗实录》卷四,《韩昌黎文集校注》,第717页。

⑤ 《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630页。

⑥ 孙正军:《中古良吏书写的两种模式》,《历史研究》2014年第3期,第4—21页。

⑦ 《白居易诗集校注》,第322页。

⑧ 《白居易文集校注》,第153页。

⑨ 《柳宗元集》,第735页。

向,即循吏个人性情的安顿问题。白居易说:“昔谢(朓)、柳(恽)为郡,乐山水,多高情,不闻善政;龚(遂)、黄(霸)为郡,忧黎庶,有善政,不闻胜概。”<sup>①</sup>善政代表的是社会政治价值,是兼济天下;高情体现的则是个人生命情怀,是独善其身。白居易从历史的角度尖锐地提出了此一问题。汉代循吏关注的是政治道德价值,六朝官吏关注的则是个人精神价值,白居易显然认为两者各有所缺,他的理想是兼顾两者。唐前期著名文人很少长任地方官,对于地方官的书写亦往往凸显其吏隐高情的一面,如王维“羨君明发去,采蕨轻轩冕”<sup>②</sup>,祖咏“宁知武陵趣,宛在市朝间”<sup>③</sup>,高适“寸心仍有适,江海一扁舟”<sup>④</sup>,可以上接谢、柳之“高情”。这种模式在盛中唐之际发生变化。这批循吏式地方官既有善政,有“忧庶黎”之精神,也兼“高情”“胜概”。白居易刺苏杭固有善政,但对自己兼得“苏杭之风景,韦房之诗酒”<sup>⑤</sup>,亦不无自得,时时流露笔下。刘禹锡突出白居易“白太守”的政治身份,但说的是他“酒酣襞笺飞逸韵”<sup>⑥</sup>。柳宗元《永州八记》既于永州山水中寄托个人情志,但如《钴潭记》对于“不胜官租私券之委积”<sup>⑦</sup>者的同情,亦是其作为地方官长“忧庶黎”的表现。其《零陵三亭记》云“夫气愤则虑乱,视壅则志滞。君子必有游息之物,高明之具,使之情宁平夷,恒

若有余,然后理达而事成。”<sup>⑧</sup>则进一步对“观游”与“政理”的关系提出观念的解释,“观游”非但与“非政”无关,反而有助于“政理”,在这个意义上,这批以地方官身份进行创作的文人,将前代善政与高情的传统拧合起来了。

### 三、循吏观念与循吏典故

对于“循吏”传统的关注致使古循吏成为唐人作品的重要资源。古循吏作为文学典故在中唐以后频繁出现,成为人物评价的重要标准。同时,随着文人对于州县官员的逐渐接受,看待古循吏的角度也发生变化,这也在循吏典故中体现出来。

古循吏作为诗文典故,有不同的类型。其一是直接以古循吏比当代地方官。如杜甫“刺史似寇恂,列郡宜竞借”<sup>⑨</sup>“昔在尧四岳,今之黄颍川”<sup>⑩</sup>,以寇恂、黄霸比拟所咏对象。戴叔伦“汉朝龚遂不为疵”<sup>⑪</sup>、权德舆“荐贤比文举,理郡迈文翁”<sup>⑫</sup>、吕温“朱邑何为者,桐乡有古祠。我心常所慕,二郡老人知”<sup>⑬</sup>,所提及的龚遂、文翁、朱邑亦都是《汉书·循吏传》的传主。另一类型是称美循良之吏的歌谣作为一种典故,不断地被唐人写进诗歌当中。诸如“郡移棠转茂,车至鹿还驯”<sup>⑭</sup>“夷陵旧人吏,犹诵两岐歌”<sup>⑮</sup>“还逢五袴

① 《白苹洲五亭记》,《白居易文集校注》第2005页。

② 《春夜竹亭赠钱少府归蓝田》,《全唐诗》卷125,第1238页。

③ 《题韩少府水亭》,《全唐诗》卷131,第1334、1335页。

④ 《奉酬睢阳李太守》,《全唐诗》卷214,第2238页。

⑤ 《吴郡诗石记》,《白居易文集校注》,第1837页。

⑥ 《乐天寄忆旧游,因作报白君以答》,《全唐诗》卷356,第4003页。

⑦ 《柳宗元集》,第764页。

⑧ 《柳宗元集》,第738页。

⑨ 《郑典设自施州归》,《杜诗详注》,第1813页。

⑩ 《赠李十五丈别》,《杜诗详注》,第1345页。

⑪ 《抚州被推昭雪答陆大祝》三之一,《全唐诗》卷274,第3106页。

⑫ 《奉酬从兄南仲见示十九韵》,《全唐诗》卷321,第3617页。

⑬ 《郡内书怀寄刘连州寔夔州》,《全唐诗》卷371,第4174页。

⑭ 钱起:《送王使君移镇淮南》,《全唐诗》卷238,第2658页。

⑮ 司空曙:《送夔州班使君》,《全唐诗》卷292,第3310页。



歌”①“惭非甘棠咏”②“风便唯闻五袴讴”③等,这些都是把时人对于当代优秀地方官的颂扬比作汉代的歌颂民谣。

前论唐人关于循吏的观念有前后期之不同,与观念的变化同步,古循吏在唐人作品中的形象也发生转变,这可以以黄霸和梅福为代表。前者揭示唐人的政治理想由礼乐转向实务的轨迹,后者则见唐人由前期要以吏隐作为出任州县官的开解方式、到后期肯定吏治本身的变化。兹分述之。

黄霸事迹见《汉书·循吏传》,史言其“少学律令,喜为吏”④,五凤三年(前55)代邴吉为丞相,然其“材长于治民,及为丞相,……功名损于治郡”⑤。其长于地方吏治而不适应中央宰辅之位,乃汉代地方官之代表。黄霸在唐代诗中频繁出现,但在前期,其形象往往还是与礼乐教化相关,而“喜为吏”的一面则被有意无意地忽略,这正合乎初盛唐时期重人文化成的主流思想。杨炯《李怀州墓志铭》序云“玺书则但称黄霸”,铭文却称其“礼乐宗正”⑥,严识元《潭州都督杨志本碑》“振文翁、黄霸之风粹”,不离“底慎财赋而行其礼典”⑦。无论是“礼乐”或是“礼典”,都是《汉书·黄霸传》所未曾提供的线索。以礼乐取代文法条教,并以之作为地方吏治的核心,正是初盛唐运用黄霸典故的基本模式。

中唐以后对于黄霸的论述发生转变。陈简甫

褒美盛唐良吏,以“黄霸课最于颍川”比之,然究其“良吏”所指,却突出其“秉法以驭下”“承法理之极”的一面⑧。陆贽以“黄霸自颍川而次迁丞相”事比拟张延赏任中书侍郎平章事,这本身就强调黄霸颍川太守的身份,又称其“崇饬文行,励精理道”“简廉以肃吏”,⑨这就突显他在地方政治上的长才而贴近《黄霸传》的吏治线索。白居易以黄霸、寇恂比拟常州和湖州的地方首长,着重“削使科条简,摊令赋役均”⑩的一面,宋申锡以“黄霸之路不拾遗”比喻李听的在地政绩,称许的是他“纠察有制,宽猛相济”⑪的手段,依然是从实政的角度运用黄霸的典故。

黄霸和龚遂被视为汉代循吏代表而并称“龚黄”,唐人对“龚黄”典故的运用也体现出对地方官态度的变化。高适《同李太守北池泛舟宴高平郑太守》:“每揖龚黄事,还陪李郭舟。云从四岳起,水向百城流。幽意随登陟,嘉言即献酬。乃知缝掖贵,今日对诸侯。”⑫李郭舟用的是汉代李膺和郭太“同舟而济,士宾望之,以为神仙焉”⑬的典故。郭太是当世名士,史称其“早孤,母欲使给事县廷。林宗曰:‘大丈夫焉能处斗筲之役乎?’”⑭这首诗标举“嘉言”和“缝掖”,突出文辞与儒术价值。高适“揖龚黄”“陪李郭”恰体现薄“循吏”而贵“文儒”的基本立场。但到中唐,白居易《寄李蕲州》云“下车书奏龚黄课,动笔诗传鲍

① 李端:《送张少府赴夏县》,《全唐诗》卷285,第3258页。

② 白居易:《三年为刺史》,《白居易诗集校注》,第700页。

③ 罗隐:《秋日有寄姑苏曹使君》,《全唐诗》卷655,第7533页。

④ 《汉书》卷89,第3627页。

⑤ 《汉书》卷89,第3632页。

⑥ 《全唐文》卷196,第873,874页。

⑦ 《全唐文》卷267,第1196页。

⑧ 陈简甫:《宣州开元以来良吏记》,《全唐文》卷438,第1976页。

⑨ 陆贽:《张延赏中书侍郎平章事制》,《全唐文》卷461,第2087页。

⑩ 《自到郡斋,仅经旬日,方专公务,未及宴游,偷闲走笔,题二十四韵,兼寄常州贾舍人、湖州崔郎中,仍呈吴中诸客》,《白居易诗集校注》,第1877页。

⑪ 《义成军节度郑滑颖等州观察处置等使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司徒使持节滑州诸军事兼滑州刺史御史大夫上柱国陇西县开国公食邑一千八百户李公德政碑铭并序》,《全唐文》卷623,第2785页。

⑫ 《全唐诗》卷214,第2231页。

⑬ 《后汉书》卷68,第2225页。

⑭ 《后汉书》卷68,第2225页。

谢风”<sup>①</sup>,龚黄考课意味突出的吏能表现,以吏才和诗才并立,至少已正面肯定前者的价值。贯休“不是龚黄覆育才,即须清苦远尘埃。无人与奏吾皇去,致乱唯因酷吏来”<sup>②</sup>,除了肯定古循吏化育百姓的贡献外,还把动乱归因于酷吏,这就承认地方官吏与政治治乱与否之间的关系,从而也肯定循吏在其中的作用。

黄霸形象在唐代诗文作品中前后期的变化,折射出初盛政治思想的变化,即从唐前期的以吏治服从礼乐到中唐以后更肯定吏治本身,从前期的重礼乐教化到中唐以后的重地方实务。

梅福亦是汉代著名的州县官员,唐代文人在地方官书写中亦多用之。然盛、中唐对梅福理解有角度之差异,此差异为我们提供另一条线索,表明中唐文人如何从表彰“吏隐”到肯定承担俗务的地方官。

《汉书》记载梅福曾多次上书皇帝,要求改革,是汉代著名的地方官。王莽篡位后他弃官归隐,不知所终,民间则传说他最后得道成仙。梅福的生平恰与盛、中唐文士所关注的问题有相契之处。盛唐以前对于梅福典故的使用,着重在其归隐成仙的部分,中唐以后,则又突出其地方官员的政治身份。

唐前期文人用梅福典故大致有两种态度,一是否定其为吏的价值;二是强调他归隐、成仙的一面。前者可以高适《封丘县》为代表。这首诗感叹为县尉必须面对“拜迎官长心欲碎,鞭挞黎庶令人悲”的种种不得意,从而推论即便是载入史书的良吏如梅福,也要面对各种违背志愿的事情,

故谓“乃知梅福徒为尔”,还不如效法陶渊明隐居田园,“转忆陶潜归去来”。<sup>③</sup>高适对梅福“吏”的身份采取否定的态度,梅福为政的一面在此诗中隐而不显。再说第二种态度。初盛唐诗人对于梅福的后半生平,亦即“归隐”或“成仙”传说更感兴趣。“隐”和“仙”本是许多初、盛唐文人的共同追求,反映在梅福典故的运用上,祖咏“梅福幽栖处,佳期不忘还”<sup>④</sup>,张子容“梅福惭仙吏,羊公赏下僚。新丰酒旧美,况是菊花朝”<sup>⑤</sup>,孟浩然“君学梅福隐,余从伯鸾迈”<sup>⑥</sup>,李白“世人若骖鸡,安可识梅生。虽为刀笔吏,缅怀在赤城”<sup>⑦</sup>,“一尉居倏忽,梅生有仙骨”<sup>⑧</sup>,都以“少府”(亦即地方县尉)为对象,但他们所强调的都是吏隐中“隐”的那一面,因此梅福总伴随着“幽栖”“隐”“仙”,或与归隐、成仙有关的意象如“菊花”“赤城”等字眼出现。李白虽然提及梅福“刀笔吏”的政治身份,但突出的是心怀“赤城”,亦即怀游仙道的部分,为“吏”的情况则不甚明了。这种态度合于盛唐以前的文士对于“吏”的理解:不满于“刀笔吏”的身份,而以吏隐来寻求自我的精神解脱。“嗟为刀笔吏”的骆宾王也正是以“长揖谢时事,独往访林泉”<sup>⑨</sup>的幽栖情怀开解作为刀笔吏的不得意。

但安史之乱以后,梅福作为“良吏”的角度被凸显出来了。钱起“皇枝双玉树,吏道二梅仙”<sup>⑩</sup>,耿漳“雕残贵有亲仁术,梅福何须去隐吴”<sup>⑪</sup>,权德舆“梅仙归剧县,阮巷奏离琴”<sup>⑫</sup>,都是典型的例子。尽管这些作品依然还是以梅福比拟地方县尉,钱起虽然也还将梅福与“仙”联系,但其创作原由是因为“美政惟兄弟,时人数俊

① 《白居易诗集校注》,第2597页。

② 《东阳罹乱后怀王慔使君》五之五,《全唐诗》卷836,第9422页。

③ 《全唐诗》卷213,第2220页。

④ 《题韩少府水亭》,《全唐诗》卷131,第1334页。

⑤ 《九日陪润州邵使君登北固山》,《全唐诗》卷116,第1177页。

⑥ 《适越留别谯县张主簿、申屠少府》,《全唐诗》卷159,第1621页。

⑦ 《留别西河刘少府》,王琦:《李太白全集》,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716页。

⑧ 《酬谈少府》,《李太白全集》卷19,第871页。

⑨ 《叙寄员半千》,《全唐诗》卷77,第832页。

⑩ 《李四劝为尉氏尉李七勉为开封尉》,《全唐诗》卷238,第2658页。

⑪ 《送大谷高少府》,《全唐诗》卷269,第3001页。

⑫ 《送二十叔赴任余杭尉》,《全唐诗》卷323,第3630页。



贤”,“梅仙”是由“美政”所决定;耿漳否定梅福最后归隐的决定;权德舆的“梅仙”是和“剧县”,亦即政务繁重的县相关联。这就不同于初、盛唐文人是从隐士的角度认识梅福。换句话说,史书中的梅福前半生是“吏”,后半生才是“隐”或“仙”,但在中唐文人笔下,他后半生的身份反而被用以形容他的吏职生涯,他是作为一个良吏与“美政”关联才被援引到诗歌当中的。即便梅福依然保有其“仙”的形象,但他的“仙气”从属于他的“良吏”之才。从梅福侧重点的转移,可见唐人对于

“吏”职看法的改变。

唐前期以礼乐作为王者化成天下的关键,匡赞王业的文章才能受到特别重视;安史乱后,唐人面对的是州县凋敝、百姓疲敝的政治现实,地方官的重要作用得以凸显,而实际的为政能力也更被看重。随着大批文人走向地方,古循吏遂成为其重要的身份认同。以循吏的身份自视,以循吏的观念思考与从政,以循吏的眼光书写,造就了中晚唐文学领域的一个新现象。考察此一现象对于全面深入理解中晚唐文学史甚有帮助。

## The Revival of the Idea of Conscientious Officials and their Writing in the Mid-Late Tang Dynasty

Lv Jiahui

(Department of Chinese and History,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China)

**Abstract:** In the political and cultural areas of the Mid-Late Tang Dynasty, the writing of conscientious officials (循吏) demonstrated the revival of the idea of the “conscientious officials” of the Han Dynasty in the literary area. In the early heyday of the Tang Dynasty, the Confucian scholars highlighted the cultivation of ritual and music in political and cultural life while disregarding administrative tasks and rejecting official documentation. Most of the Confucian scholars were reluctant to take the office at the prefecture or the county level. After the Rebellion launched by An Lushan and Shi Siming (安史之乱), the Confucian scholars’ ideal lost its realistic foundation due to the pressing need to reconstruct political order. As the prefectures and counties became impoverished and were badly in need of reconstruction, great changes took place from the institutions to the ideas. Political capabilities were emphasized and the function of local officials became obvious. Lots of Confucian scholars took up the posts at the prefecture or the county level, and built up their own status and value identity by following the example of classical “conscientious officials” or “upright officials” (良吏). All this led to the revival of the idea of the “conscientious officials” in the Mid-Late Tang Dynasty. These local officials did their writing on the basis of the idea and vision of the “conscientious officials”, bringing about the phenomenon of the writing of conscientious officials and forming a new writing pattern in the literature of the Mid-Late Tang Dynasty.

**Key words:** conscientious official (循吏), Mid-Late Tang Dynasty (中晚唐), writing pattern, local official

(责任编辑 郑园)

## 文 研 讲 坛 ( 之 四 ) 历史人类学研究的 中国 经验

## 主 持 人 语

三十多年前,海内外的一些历史学者和人类学者开始以传世文献和地方民间文献、观察访谈并重的方式,尝试通过区域研究对中国社会的历史进行重新解释。他们起初被称为社会史研究中的“田野派”,后来又多被称为“华南学派”,但他们自己或将研究归类为区域社会史或历史人类学。可以说,他们的研究路径开启了目前已蔚然大观的对地方民间文献的搜集和整理工作、通过解读文献和田野实践训练研究者的田野工作坊模式,以及对传统的历史文献学的再思考。2017年7月3日,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主办的第46期“文研论坛”题为“中国历史人类学研究的南方经验与北方经验”,邀请了十位学者分享了他们的研究心得,本期文研讲坛各篇文章的作者,就是其中的四位。

将社会史研究视为“碎片化”的无关紧要的地方性个案,或与国计民生的重要内容无关,已被不断证明为短视的无稽之谈。刘永华的文章是从明代的役法入手的,侧重讨论匠户和军户,这是传统的制度史和经济史极为关注的问题。但是他以此讨论了明代移民之外的跨地域流动和由此形成的跨地域网络,这样一种由国家体制制造出来的“民众服役网络”创造了一种非常复杂多元的、超越制度制订者初衷的社会空间。虽然因卫所军士及家属在地化、赋役折银等原因使此这种跨区域流动大幅减弱,但与此同时,却出现了更大规模的、由市场主导的社会流动,这二者之间究竟是何种关系?后者导致了前者的变质,前者造成的网络又为后者铺平了道路?此外,在某些时间,还出现了以反抗现存统治秩序为形式的跨区域人口流动,比如明末的“流寇”,这又与前两种流动不无关联。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重新思考。

谢湜的文章通过他及其团队所进行的南岭山区和浙东海岛地区的田野个案,展现了明清易代以后某些“边缘”地带或界邻地区社会“再结构”的复杂图景。尽管在更早的时期,南岭以外或浙闽沿海已经设置了王朝的管理机构并实施了直接控制,但直至明代,南岭山区和东部海岛还是一些流动性很强的人群在活动,包括山区的瑶人、畲人和水上人群,这也正是为什么南明政权可以在这一带地区长期延续。到康熙中期内陆和沿海的局势稳定之后,这些地区的不同人群各自利用某种曾有的定居或在籍人群的符号,作为获取某种合法身份的策略,再通过其后的编纂族谱或讲述有关祖先入籍的故事,对此身份不断加以强化。当然,正如谢湜指出的,这些行为和文本有可能有意无意地遮蔽了他们真实的利益诉求。在这一过程中,我们似乎看到了清康熙以后东南边疆的地方人群与国家的能动行为“共谋”取得的双赢结果,当我们把这些纷乱的地方“碎片”进行简化之后,呈现出的图像是元明时期这些地区的“乱象”到清代已经得到相当程度的澄清。我们下一步希望了解的是,经过“确权”之后,这些人究竟想做什么和做了些什么。

乍看起来,杜正贞利用民国年间浙江龙泉县司法档案的研究很像是一项法制史的研究,当然,也可以视其为法制史。但是,她所关注的重点并非诉讼或司法过程本身,而是试图考察地方的传统习惯或习俗在这一过程中如何得到确认,换句话说,就是传统习惯或习俗如何在这一过程中变身为制度的组成部分。当学界响应了“活的制度史”的倡导之后,更多地看到的是对制度实践的重视,却较少对制度的来源问题进行反思。但这只是第一步,进一步探索习惯或习俗如何被乡民在生活中确认、遵守和笃行,则是合逻辑的自然之举。在这一步,作者又对关于习俗或习惯形成的传统观念提出了尖锐的挑战,无论习惯法学者还是民俗学者都必须正视。她将习俗或习惯视为一种充满弹性的、时刻受制于人的现实动机

和行为的创造,成为说明何为历史人类学之一例。当然,对于习惯或习俗形成或被认定的固化的看法,常见于缺少田野实践的某些习惯法或经济学学者的论述中,在历史学者中也同样如此,但在较多生活经验的人类学者或民俗学者那里就未必然,比如作者推许的坦纳,就是一位人类学者。

作为一项历史人类学研究,贺喜文章的叙事方式显然是“逆推顺述”式的,看起来与传统的历史研究颇为不同。虽然海南至少自唐代就进入了正史叙事之中,但时至今日,那里的历史依然很难进入主流的史学研究的视野,说明我们的史学实践和我们认同的人文理念相距甚远。即使是学界关注的那些边疆、民族史事,也大多与中原王朝的演进更迭相关,这固然不那么“碎片”,却显示出强烈的话语霸权。文章寻找那个被现代宏大叙事遮蔽的“合亩制”的真相,是通过对当代人的访谈发现线索,再“逆推”到明代中叶、特别是清末民国初海南黎族地区的开发和黎族如何被“发现”和认知的过程中,才能最后实现。我们也看到,地方精英的口述及基于此的 20 世纪 50 年代调查报告、围绕冯子材开路的清朝官府材料,和关于本地族群分类及其展示的记录,分别是三个不同系统的资料,不仅出发点不同,代表的时代不同,力图达到的目的也不同,因此看起来勾画出了三幅各不相干的图景。能够把这三者间的逻辑关系勾连起来的关键点在哪里呢?是现代性、殖民主义及其应对吗?

用来支持这四篇文章的观点和体现其方法的例子,大多出于南方的个案,似乎没能实现中国南方和北方历史路径相互比较的讨论初衷,这既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就前者而言,我们一时未能寻找到合适的、在说明历史人类学的中国研究之理念与方法方面较有代表性的文章;就后者而言,也是此类研究毕竟发端于华南,经历了较长时间的积累,区域性的认识较为成熟的缘故。不过,与早期的华南研究相比较,这四篇文章在地域上已从成果丰富的珠江三角洲及闽台、香港地区大大向外延伸,谢湜研究的南岭北部和浙东沿海地区、杜正贞研究的浙南地区、贺喜研究的海南黎族地区,都是过往的区域研究中非常薄弱的地区,即使是他们的研究,也只是一个起步。而刘永华和谢湜的研究,已经在考虑如何将区域研究过渡到跨区域研究的机制性维度。

这可以视为中国的历史人类学研究的部分第二代学者的创新尝试和自我挑战。但这种尝试和挑战更多地体现为这四篇文章初步展现出的方法论意义,而这正是第一代学者在倡导区域社会史和历史人类学时希望看到的。尽管在这一组文章中,我们没有看到以北方研究个案为基础的经验总结,但文章中显现出的方法论和跨区域研究的意义是带有普遍性的。更为重要的是,一直以来,学界对于社会史研究呈现出的某种“碎片化”的倾向多有批评,但这里呈现出的对中国社会的结构性认识和动态性分析,不仅足以回应这类批评,而且昭示了立足于本土历史经验和国际学术对话的中国研究的美好前景。

——赵世瑜